

第一章 发展经济学的兴衰

我有一位朋友，对研究非洲有浓厚的兴趣，而业余爱好是收集古代地图。他把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了一篇他称为关于非洲的“无知的进化”的有趣的文章。文章描述了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欧洲人绘制的非洲大陆地图是如何不断演变的。^[1]

你可能会猜想该过程或多或少是线性的：随着欧洲人对非洲大陆逐步地了解，地图会越来越精确，具体的细节信息会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 15 世纪，非洲地图上的距离、海岸线等等当然都十分不准确。然而尽管那时的地图主要是根据二手甚至三手的旅行者报告绘制的，但是它们的确包含了内陆地区的大量信息。比如，地图上已标明廷巴克图（马里城市），尼罗河等地方。不可否认，这些地图也包含了相当多的错误信息，如地图上有一些地区，那里的居民的嘴在胃中。尽管这样，15 世纪早期地图上的非洲是一个充实的区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绘制地图的工艺水平和用来绘制地图的信息质量有了稳步提高。有人首次沿非洲的海岸线进行了考察，因此，绘制出的地图更加精确了。到了 18 世纪，绘制出的海岸线已基本与现代地图中的海岸线看起来难分伯仲。沿海城市和人口也相当详实地展现在地图上。

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却出现了更多的空白。虽然那些虚构的事物没有了，但真实的城市和河流也从地图上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人对非洲的了解甚至比以前更少了。

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绘制地图的工艺的提高对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像“从沙漠边缘出发向南走六天，你会看到一条由东向西的大河”这样的二手报告不再被当作绘制地图的依据。现在只有装备有六分仪和指南针的可靠的信息提供者考察过并提供的地形特征信息才是合格的资料。因此，以前的地图中拥挤（可能还使人迷惑）的内陆地区就成为“最黑暗的非洲”，一片空白。

当然，到 19 世纪末，已有人对最黑暗的非洲进行了考察，并精确地绘制在地图上。最终，现代地图绘制的方法越来越精密，地图质量也越来越高。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技术的改进事实上导致了某些知识的丢失。

看到这儿你无须担心，尽管这些讲座的题目中有

“地理学”的字样，但是它们并不涉及如何绘制地图，或者说至少与可以挂在墙上的地图无关。我将讨论的是经济学中思想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介绍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两个相关学科的故事。

当然，从事经济学研究，或者是进行任何学术研究也一样，其实都是在绘制地图。理论经济学家掌握的经济信息——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数据，相当于装备有六分仪的探险家的工作结果，一部分是逸事趣闻，相当于旅行者讲述的传说。理论经济学家试图借助这些可靠与不可靠的证据，加上事先的信念（不但证据不足的时候用它来补充，而且有时用它来驾驭显而易见的证据），来描绘一幅经济运行的图画。

但是，这幅图画究竟有多完整？在这些讲座中，我将对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这两个领域中的思想演变给出一种解释。我将证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上述两个领域均发生了某种循环，它与制图技术的提高暂时减少了欧洲人对非洲了解的故事有些类似。对准确性和逻辑性的要求提高后，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会大有改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可能使人们不愿意研究那些信息质量达不到新技术要求的领域。一些以前有许多人研究的领域——不管多么不完善——因而很少有人涉足。只有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才会逐渐有人重新研究这些被遗忘的领域。

为什么我选择这两个领域？首先，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学术基础。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在二次大战以后都曾繁荣一时，而且都建立在同一个基本洞察的基础之上：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但市场规模反过来又受到劳动分工的影响。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加强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而一个地区可能会经历自我加强的聚集过程。

然而，将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一些共同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它们各自的历史上都曾促进了它们的发展，而且，我还将说明，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们都面临同一个特有的问题，正是它使得这些思想未能跻身主流经济学的思想。

为什么经济学家把有些思想拒之门外呢？在外行看来，无论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新工业国理论还是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有关财富与贫穷的观点，看起来都十分合情合理，但学术界却不愿意认真考虑，这使们感到难以理解。他们不理解经济学家决定取舍的标准；一个论证有力、既符合史实又有趣闻逸事支持的思想，为什么就比不上其他思想呢？对经济学有成见、对这种现象感到困惑的人常常把主流学术界不愿考虑他们或他们的朋友观点的原因归咎于不正当的动机——行会思想，即拒绝考虑非业内人士或以非专业

术语表述的思想——或者归咎于政治偏见。

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经济学家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有他们的政治偏见，但这对他们愿意考虑什么思想的影响绝对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例如，你可能会以为像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那样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至少会对受到马克思（Marx）启发的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或加尔布雷思这样的异端经济思想家的观点抱有温和的同情态度。毕竟，在历史和社会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都受到尊敬。但是你不会看到发生下面的事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与他们保守的同行一样异口同声地谴责异端左派思想是愚蠢的——正是自由主义者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而非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与英国激进主义者进行的艰苦的“资本之争”中为正统思想辩护。

同样，你可能会认为保守经济学家们会替供给学派中他们的政治同盟说说好话，或许还会任命几位供给学派的忠实信徒在他们的系里任职。但实际上即使在明尼苏达或卡内基—梅隆这样相当保守的经济学系，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那么这仅仅是行会思想吗？你只有获得博士学位才有发言权吗？但是，获得博士学位——甚至拥有卓越的学术声誉——并不能保证你的经济学观点会受到尊敬。想一想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莱斯特·瑟

罗（Lester Thurow），在普通公众看来，他们都是优秀的经济学家，都受过非常正式的训练，却都被主流学术界完全置之不理。或者再看看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他在国际货币理论方面的贡献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他后来成为供给学派之父这一点也同样被忘记了。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非学术人士的观点却有可能受到尊重——近几年里，一个异端的城市观察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s）已成为新增长理论的守护神。

那么，为什么有的思想被人们接受，而有的却被拒之门外呢？答案对于局外人也许有些神秘，但对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而言却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只有可以模型化的思想才会得到垂青。现代经济学里一个经过适当模型化的思想对经济学家的意义就与经过正规勘察的地区对 18 世纪绘制地图工匠的意义一样。

关于什么是“适当”的经济学模型以及我们所认为的“适当”的概念是如何不断变化的问题，我现在暂且不谈（我将在本讲座下面的部分进一步谈及这个问题，并在第三讲中详细阐述）。20 世纪 40 年代崭露头角的发展经济学以及几乎同时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我个人认为原因很清楚：它们的缔造者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致命的问题是该领域的先驱没有明确地说明市场结

构，即在他们所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不从事严肃的经济学建模工作的人，不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这为什么竟然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对于把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诸多努力而言，市场结构的难题却被证明是致命的。

上述内容可能听起来相当抽象。因此，就让我介绍第一个例子：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衰落和复兴的故事。

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领域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贫穷，同时为穷国致富出谋划策。20世纪50年代是这个领域如日中天的时代，发展经济学的思想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和具有革命性的，不仅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且对真实世界也有重大影响。另外，发展经济学吸引了众多富于创造力的学者，是个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

那个领域永远消失了。当然，现在仍然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研究。他们提出的某些问题是各国都普遍存在的，但另外一些则是较贫穷的国家特有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仍然有一个集中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的领域。不过它是一个发散的领域：比如研究第三世界农业的经济学家与研究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贸易的经济学

家即使有共同的研究内容，也微乎其微，他们也与研究债务、恶性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没有共同语言。而且现在几乎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敢自称可以提出穷国为什么穷，或者怎样改变贫穷的重大假说。事实上，一场“反革命”把发展经济学扫地出门了。

不过现在人们越来越觉得这场“反革命”过了头。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发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现了有关外部经济，战略互补性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许多思想，它们现在在学术上仍然得到承认，或许仍然对实践有指导意义。这些思想——我称它们为“超发展理论”^[2]——从多个角度预测出现代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前沿。

但是必须重新发掘这些思想。从1960年到1980年之间，超发展理论事实上被埋没了，主要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不能十分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使得他们很难与其他经济学家交流基本的思想，甚至这些创始人彼此之间也难以沟通。直到最近，经济学发生了变化，才使人们有可能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找回遗失的重要思想。

大推进

我们讨论的最合适的起点莫过于保罗·罗森斯坦

—罗丹（ Paul Rosenstein-Rodan ）的文章《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真正的黄金时代就是从它开始的。这是一篇十分通俗易懂的文章，但令人惊异的是它引发了许多种解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本质上它是一篇凯恩斯主义的文章，讨论乘数与加速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罗森斯坦—罗丹本人似乎对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的思想有所了解，但做了重要的修正（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主张增长必须基本上是“平衡”的，才能取得成功——事实上，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就主要反驳罗森斯坦—罗丹和其他平衡增长学派的学者，我将说明这是一种误解，而且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试图援引收入、储蓄和人口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来构造低水平均衡陷阱（例如，莱本斯坦恩（ Leibenstein ）1957，纳尔逊（ Nelson ）1956）；从这样的机制也可以得出大推进的结论，但它们与原作的精髓相去甚远。

不过在 80 年代后期，墨菲（ Murphy）、施莱佛（ Shleifer ）和维什尼（ Vishny ）（1989）对大推进做了一个正式的表述，他们的表述与大推进原来的精髓十分接近，也很能说明超发展理论的实质。下面我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他们的模型，然后看看它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先来考虑一个不参与国际贸易的封闭经济（这听起来有点老掉牙，而且与我们所处的这个出口创造了大量经济奇迹的时代相距十万八千里，也许如此——尽管后面我将证明通过修正，可以使它符合现代经济。不过，现在我们还是按原来的规则开始吧）。通过对要素供给、技术、需求和市场结构做出假设，我们就可以描述这个假想经济了。

要素供给 这个经济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总供给量固定，为 L 。有两个部门，一个是“传统”部门，特点是规模报酬不变，一个是“现代”部门，特点是规模报酬递增，劳动可在任何一个部门就业。尽管传统和现代部门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但要素报酬并不相同。劳动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工资必然会上升。用 $w > 1$ 表示工人在现代部门得到的工资率与在传统部门得到的工资率之比。

技术 假设该经济生产 N 种产品， N 是一个足够大的数。我们选择适当的单位，使得传统部门生产所有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是 1。在现代部门中，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递减。为简化起见，假设递减的成本采用一种线性形式。设 Q_i 表示现代部门生产产品 i 的产量。那么若现代部门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可以用下式

表示：

$$L_i = F + cQ_i, \quad (1)$$

其中 $c < 1$ 是边际劳动需求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所有 N 种产品的投入产出关系相同。

需求 对所有 N 种产品的需求函数是对称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也就是说，用于购买每一种产品的支出在总支出中占一个固定的份额： $1/N$ 。本模型是静态的，资产不会增加或减少；所以支出等于收入。

市场结构 假定传统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传统部门生产的每一种产品，在价格等于生产的边际成本处，供给都是完全有弹性的；给定我们选择的单位，以传统部门劳动衡量的这个供给价格是 1。比较而言，假定现代部门中每一个企业家独家掌握生产一种产品的技术。

这样的生产者如何定价呢？给定柯布—道格拉斯需求和产品种类足够多的假设，它面临的需求弹性是 1。如果它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垄断者，那么它会无限制地提高价格。但来自传统部门的潜在竞争限制了产品价格：如果价格高于 1（以传统部门劳动衡量），那么传统部门的生产者就会抢走它的生意。因

此现代部门的每个生产者都会与传统部门的生产者制定同样的价格，即 1 。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生产究竟是在传统部门还是在现代部门进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画一个简单的图表（图 1.1）。横轴是生产一种典型产品的劳动投入 L_i ，纵轴是该部门的产出 Q 。两条实线代表两个部门的生产技术： 45° 线代表传统部门，斜率为 $1/c$ 的直线代表现代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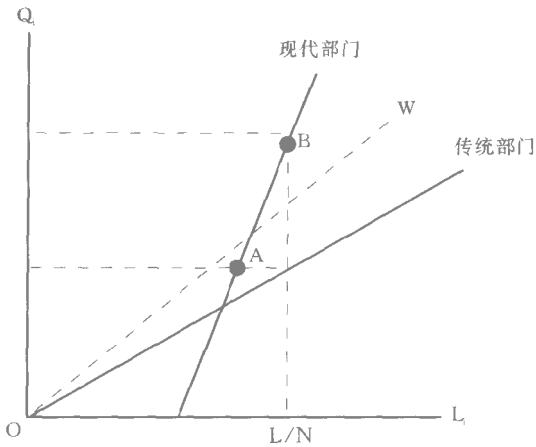


图 1.1

从图中马上可以看出如果全部劳动均投入现代或传统部门，该经济会生产多少。不管劳动全部投入现代部门，还是全部投入传统部门，每一种产品的生产

都将使用 L/N 个工人。如果所有产品都由传统部门生产，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是 Q^1 。如果所有产品的生产均使用现代技术，产量是 Q^2 。如图所示，只要

$$\frac{(L/N) - F}{C} > L/N, \quad (2)$$

就有 $Q^2 > Q^1$ 。

即只要现代部门生产的边际成本优势足够大，以及 F 或固定成本不太大，就出现图中的情形。因为这种情形很有趣，所以我们下面重点研究它。

但是，即使该经济采用现代方法生产得更多，也并不意味着它会这么做。只有当考虑到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 w 以及所有其他企业家的决策等因素以后，生产仍然有利可图，现代部门的企业家才会决定生产。

假定一个厂商开始用现代技术进行生产，而其他所有产品仍采用传统技术生产。该厂商的定价会和其他产品相同，因此销售数量也相等；因为产品种类很多，所以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收入效应，假设每一种产品的销量仍为 Q^1 。那么该厂商生产的产量和雇佣的工人数量如图中 A 点所示。

这个行为有利可图吗？该厂商使用的劳动比采用传统生产方法所需要的劳动更少，但必须付给劳动更高的工资。从原点出发画一条射线，它的斜率为现代部门的相对工资 w ；例如图中 OW 线。那么给定其

余厂商用传统方法进行生产，当且仅当 OW 线位于 A 点下方，该厂商用现代方法进行生产才是有利可图的。如我此处所画，这个条件当然不成立：即一个厂商单独用现代方法进行生产是无利可图的。

另一方面，假定所有厂商同时用现代方法进行生产。那么，每个厂商都生产 Q^2 ，产量和工人数量如图中 B 点所示。同理，当且仅当工资线 OW 位于 B 点下方，厂商才有利可图。如图所示，这个条件是满足的。

显而易见，可能出现三种结果。^[3]如果工资差距 $w-1$ 较低，经济总会“工业化”；如果较高，永远不会“工业化”；如果它取中间值，则低水平均衡与高水平均衡并存。

虽然我们假定仅仅对某些参数值会出现多重均衡，但我们很难从这个模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人们很容易对这些假定的正确性提出怀疑。不过这个模型仍可作为考察发展模型的一个有用出发点。

分析性结论

至少可以把大推进模型看作是揭示了金融外部经济对于发展的潜在作用，这种外部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以及外部经济的模型必须包含哪些内容。

外部经济 若模型中存在两个均衡，从一个均衡移动到另一个均衡，其中就必然存在有意义的外部经济。即使我们把现代部门较高的工资看作是对于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提供的补偿，即工人从传统部门转移到现代部门后工资的提高并不改变其福利水平，情况仍然如此。即便在那种情况下，工业化均衡仍然创造了利润——如果不工业化这些利润就不存在，而工人福利保持不变。假如再考虑效率工资论或过剩劳动论——这至少使工资的提高显得更可贵——上面的情形更会成立。

但是在模型中没有技术外部经济。那么，为什么金融外部经济在这里很重要呢？

必要条件 在这个模型中产生外部经济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生产中必须存在规模经济。这很直观：如果现代部门没有固定成本，那么现代厂商是否获利并不取决于采用现代技术的其他厂商的数量。

第二，现代部门必须能够从低工资的传统部门中吸引劳动。我想就这点稍微多说几句，我认为这个条件的实质是现代部门面临一个有弹性的劳动供给，即存在无法在其他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岗位就业的劳动（这是模型让人觉得有点凯恩斯主义味道的地方）。因此，正是内部规模经济与有弹性的劳动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事实上的外部经济。

建模 这是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为了写出一个逻辑一致的大推进模型，必须处理好市场结构的问题。只要现代部门有不可耗尽的规模经济——这对整个论证至关重要——我们就必须将现代部门模型化为不完全竞争的部门。墨菲等人的模型，通过假设存在多个定价受到限制的垄断者来引入不完全竞争。尽管（我们很快会看到）它不是万能的，但用在这里还是一个不错的方法。然而，关键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市场结构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说超发展理论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它本质上是与不完全竞争紧密联系的。如果你像许多经济学家那样回避这个问题，只会把事情搅得一团糟。

不幸的是，现在并没有通用或哪怕既有道理又易操作的不完全竞争模型。那些易操作的模型通常包含有关偏好、技术和行为，或三方面的随意假设。这就意味着要研究发展理论，你必须有勇气犯错误，为了得出令人信服的非凡见解，写模型时必须不拘小节。

这不是什么新教训。大约十几年前贸易理论家们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为了重建贸易理论，要考虑报酬递增，必须不能受所谓普遍性的约束；几年后增长理论家们得到了同样的教训。超增长理论因为没有进行同样的超越而显得步履蹒跚。

超增长理论的因素

我在上一部分介绍了一种新的大推进模型，借这个例子来激发大家的兴趣，并阐明一些问题。现在我想从更早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发掘出更多的重要因素。

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

随手翻翻发展经济学文献，不难发现 1960 年大概是一个分界线。在 1960 年以前，研究发展问题的作者通常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国家成功发展工业的一个制约因素，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金融外部经济对福利的影响很大。不过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规模经济已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将竞争明确地模型化的问题，或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的模型的方向发展。

相比之下，1960 年以后，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都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一般均衡框架中训练出来的，与其说他们拒绝认为规模经济可能很重要，不如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

在前面的大推进模型中，内在于厂商的规模经济与生产要素弹性供给交互作用，产生了对真实福利水平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外部经济。现在回想起来，超发